

「邵族」與「鄒族」： 日治時期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建構*

陳計堯**

摘要

過去，無論在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所謂的「邵族」）、阿里山地區（所謂的「鄒族」），甚至在廣泛的臺灣社會民眾之間，均曾流傳「邵族」是「鄒族」一支的這種看法或知識。本文即以日治時期對於今天被通稱為「邵族」的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之認識為討論中心，並暫時擱置過去人類學對於「邵族」的族群分類之學術內涵，探討在日治時期「邵族」是「鄒族」一支的這種說法或知識的形成過程，並以此試圖釐清這一個多層次的歷史概念。

綜觀本文所論，在還沒有族群概念的清代，日月潭地區人文景觀記錄裏日月潭與阿里山地區之間，是明顯地被分開來看待的。到了族群分類開始建立的日本時代，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也進入被分類的階段。不過，對於「邵」的族群分類與認識，卻受到不同層次的社會成員不同的解讀，而出現不同的說法。換言之，「邵族」是「鄒族」的一支的說法，在日治時代的政府與學術界均未成型。把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看為「鄒族」一支的源頭，卻是來自日治時期發展的日月潭地區觀光事業。特別是自一九一六年以來，日月潭出現「追白鹿」的「口碑」，並經過附會而成為在一九二一年左右出現的「化蕃之由來」木牌，使得當地原住民的由來具體地化為文字，介紹給來自外地

* 本文原於 2000 年 8 月 3 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第四回)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桃園縣復興鄉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會議上，以〈「邵族」與「鄒族」：日治時期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論〉題目宣讀。本文的完成，須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老師的啟發、幫助與鼓勵。本文亦曾得到該次研討會與會的各老師（特別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各同學們的寶貴意見，也感謝鄒族的 Ino 高汪白玉女士、大哥 Avayi 高德生先生在山上的照顧。日文翻譯方面，得到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學教育學系許佩賢教授的幫助，使錯誤得以糾正。筆者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筆者在此一併銘謝之。

** 作者現職為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的觀光客人。所以，當人類學者們還在以不同的類別來處理日月潭原住民的族群分類的同時，社會民眾與外地旅客便已經接觸經過層層附會的說法，以致可能認為「邵族」是「鄒族」一支。

關鍵詞：日月潭地區原住民、邵、族群、化蕃

一、前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筆者因爲一位「鄒族」的「大哥」Avayi 之父過世，所以到阿里山鄉特富野社向故人作最後的致意。隨後，筆者又因要趕往日月潭日月村，整理有關「邵族」照片展的資料，只好向 Avayi 道歉，提早離開。在申明提早離開的原因之後，卻與 Avayi 展開一段有意義的對話，內容主要是環繞著「鄒族」與「邵族」的關係。Avayi 認爲「邵族」是「鄒族」的一支，所以最近在部落裏舉辦祭典時，都會在會場裏掛上「鄒 Svatan^v 群」的標示；Svatan^v 指的是在「鄒族」世界觀裏住在日月潭的人。但後者卻一直未接受邀請，前來參加祭典。Avayi 又認爲因爲「Svatan^v 群」漢化太久，故此已經不會講鄒語，卻保留了古老的閩南語音。二〇〇〇年五月中，筆者再與 Avayi 一家到梨山一帶遊玩，沿路經過日月潭時，Avayi 的母親，也是筆者鄒族的「母親」（Ino）就說：「這裏也有我們鄒族啊！」當筆者問她這種看法是從哪時候知道的，她只說：「很久以前就有啦！」從祭典會場裏掛有「鄒 Svatan^v 群」的標示來看，這種「鄒族」與「邵族」的關係之認知，不只是 Avayi 的個人觀念，而是一種集體的想法。而從筆者的 Ino 之回答也可以知道，這種「邵族」是「鄒族」一支的看法，的確已經存在很久。然而，這種說法並不只是在「鄒」的部落裏流傳，甚至是日月潭地區原住民——「邵族」之中的一些人也曾經這樣認爲，並經一些外界人士的牽引，到過阿里山鄉進行「認親」活動。¹ 雖然結果是使得一些「邵族」人更強化對「邵族」（而非「鄒族」）的認同，但可以想見，這種「邵族」是「鄒族」一支的看法，亦曾經一度流行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以及更廣泛的臺灣社會民眾之間。

到底在歷史上「邵族」是否「鄒族」的一支？誠然，這個問題本身自有其重要性，並沒有因爲政府對族群的分類已經有了新的界定²

¹ 謝世忠，〈身份與認同：日月潭邵族的族群構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年5月1日至3日，頁13，未刊稿。

² 見早於中華民國行政院民國90年8月8日發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函（臺九十疆字第〇四三九一四號）已經批准「邵族」新的認定案。對外則在稍後的一個月公佈，這方面是根據《臺灣原住民電子報》謂：「邵族目前是臺灣原住民族群人口最少的一族，於民國九十年

而改變，但筆者在這裏無意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在我們討論這些原住民的同時，都會使用「族群」的概念，但卻忽略了「族群」概念是近代的產物這一事實。最近，陳偉智的研究便指出，清代對原住民分類時所使用的「生番」、「熟番」概念，是具有行政含意的，但到日本統治時期才出現以「種族」、「族群」等概念的分類法。雖然，日治時期的人類學者們對於原住民的分類有各自的看法，但他們大都是在「種族」、「族群」的典範（paradigm）之內運作。³ 所以我們在利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族群」概念來回溯歷史時，便可能會與歷史事實出現落差。

雖然我們暫時沒有辦法來釐清歷史上「邵族」與「鄒族」之間的族群關係，但卻可以檢討「邵族」是「鄒族」一支這種看法，在臺灣社會民眾之間是甚麼時候出現？日治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研究一方面留下豐富的資料，讓我們可以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各方面；同時，這些資料也留下線索，讓我們可以追索各種看法的產生過程。故此，本文便希望先把過去人類學對於「邵族」的族群分類之學術內涵暫時擱置，更放開為人關心的「鄒族」與「邵族」在歷史（文獻與口傳）中的關係，以及在兩族之中對各自的認識，轉為探討在日治時期在文字（漢、日文）記錄中「邵族」是「鄒族」一支的這種說法或知識的形成過程。這種過程不單象徵著時代的改變，更可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臺灣內部各族群之間，在認知上互動交錯的基礎。本文便希望以日治時期對於今天被通稱為「邵族」的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之認識為討論中心，試圖釐清這一個多層次的歷史概念。

二、「水沙連」與「阿里山社」

在討論日治時期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之建構過程之前，就必須回溯在清代對這個地區原住民的認識。在清初，日月潭地區的原住民聚落均被編入一個比日月潭更大的區域裏——「水沙連」。這

九月二十二日經邵族人努力爭取，獲官方正式列入臺灣原住民族之第十族，……。」這是「邵族」史上一個新的發展，見 GAIS 關於該報 2003 年 1 月 15 日網站紀錄，<http://www.kgu.com.tw/place/Idasau.htm>。

³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個區域在財政上就如郁永河所謂「水沙連雖在山中，實輸賦貢」，意即雖然處於「山中」（當時在「番界」外），實際上卻向清政府納餉。⁴ 周鍾瑄《諸羅縣志》亦曾記錄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水沙連思麻丹社」的名目，單獨向清政府繳納「陸餉」十二兩。⁵ 至於日月潭地區各社的社民，雖然他們在清政府所立的「番界」之外，而不被視為「熟番」；但因向清政府歸化輸貢，故被看成與不接受清政府號令之「生番」有別的「化番」——「水沙連歸化生番」。⁶

而這個「水沙連」地區在康熙末至雍正時，其範圍大約包括今天的斗六以東，涵蓋南投縣集集、水裡、仁愛、信義等地方。⁷ 自康熙末年到乾隆二十年代，清政府不斷地變動「水沙連」的內容，從早期的三十八社陸續變化至乾隆二十年代的二十五社；⁸ 這二十五社卻始終未曾包括「阿里山社」；在行政與財政上，「水沙連」地區與「阿里山社」之間均有明顯區別的。

當時便有不少官員因事而進入這個地區，因而留下了一些文字記錄。例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郁永河〈番境補遺〉中有云：

水沙連雖在山中，實輸賦貢。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自柴里社轉小徑，過斗六門，崎嶇而入；阻大溪三重，水深險，無橋梁，老籐橫跨溪上，往來從籐上行。外人至，輒股慄不敢前，番人見慣，不怖也。其番善織罽毳，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⁹

⁴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1959；1697 年原刊），頁 55。

⁵ 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1962；1717 年原刊），頁 100。

⁶ 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20-28。

⁷ 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310-311。

⁸ 這二十五社包括映裏社、社仔社、毛啞社、蠻戀社、水扣社、木武郡社、子黑社、子希社、貓蘭社、倒咯社、貓丹社、埔裏社、內眉裏、水眉裏社、內斗截社、外斗截社、平來萬社、致霧社、哆咯啞社、福骨社、田仔社、田頭社、思順社、挽蘭社等。見黃智偉，〈統治之道〉，頁 313-315。

⁹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5-56。

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鍾瑄編纂的《諸羅縣志》〈雜記志·古蹟〉也謂：

水沙浮嶼：水沙連四週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而入潭，廣七、八里，如環圍可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為屋，則社有火災。岸草蔓延，繞岸架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耕，謂為浮田。隔岸欲詣社者，必舉火為號；番划蟒甲以渡。嶼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也。¹⁰

再有藍鼎元於康熙末年來臺討平「朱一貴之亂」之後所寫的〈紀水沙連〉，對於當地原住民的人文景觀有以下的描述：

自斗六門沿山入，過牛相觸，溯濁水溪之源。翼日可至水沙連內山山有蠻蠻、貓丹等十社。控弦千計、皆鷙悍未甚馴良、王化所敷、羈縻勿絕而已。水沙連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匯為潭。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番繞嶼為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為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為屋，則社有火災，是以不敢。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罾罟，駕蟒甲，挾弓矢射之，須臾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洵不知帝力於何有矣。蟒甲，番舟名，剝獨木為之；划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三、五人。環嶼皆水，無陸路出入，胥用蟒甲。外人欲詣其社，必舉草火，以煙起為號，則番刺蟒甲以迎；不然，不能至也。……¹¹

從郁永河、周鍾瑄，到藍鼎元等清政府在臺官員，除了對於日月潭地區地理形勢、進入路線等有深入的描述之外，對於其原住民的經濟生活、禁忌、習俗等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些清朝官員明白地告訴讀者，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日月潭地區已經有原住民聚落。位於日月潭中的島嶼「珠仔山」，更是與當地原住民的生活、信仰有密切的

¹⁰ 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第二冊，頁 284-285。

¹¹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1958；1732 年原刊），頁 85-86。其舊序係康熙 61 年作。

關係。原住民以狗毛、雜樹皮來織的毯子，也是外界有名的土產織品。原住民所乘的獨木舟，也被看成是當地的特色而記錄下來。可是，對於這些（甚至是其他大多數在臺的）清朝官員而言，日月潭地區的人文狀況，似乎亦不與今天一般被認為是「鄒族」的阿里山各社（踏枋社、豬母嘜社、鹿楮社等）有任何關係。

這個時期刻意地把「水沙連」與「阿里山社」放在一起的只有黃叔瓚。在乾隆元年（1736）刻印的〈番俗六考〉裏，黃叔瓚先把全臺原住民分為南北兩路，北路稱「諸羅番」，細分為十類；南路稱為「鳳山番」，分為三類。每一類別中，均載其風俗、日常生活等等見聞。¹² 除此之外，黃氏也重錄郁永河、周鍾瑄關於日月潭地區的記錄，以及把類似他們所描述的事物，再說一遍：

……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山上結廬而居，山下耕鑿而食。湖水縈帶，土番駕蟒甲以通往來。環湖皆山，層巒險阻。屬番二十餘社，各依山築居。山谷巉巖，路徑崎嶇；惟南北兩澗沿岸堪往來，外通斗六門、竹腳寮，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以居焉。……¹³

其實，〈番俗六考〉對於原住民聚落的分類法，其行政的意味似乎大於族群識別。這一點可以從〈番俗六考〉序言看出：

臺盡番地也，……；海外于役，實以綏輯為難。恭聆聖訓，以臺地土庶，盡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無長子孫以世居者；諸番迺土著之民，其令有司撫恤之。余始來此，見其盱眙渾噩，質勝而野。迨歷其境、止其舍、目擊其飲食動息，與中土人民無二；長跪送迎，悚然知惕。既以謙從弁，秋毫不犯，則又驩然交欣；瀕行，耄孺攀依不忍舍；此固天性未漓。豈降才爾殊耶？近者，社中間有讀四子書、習一經者，鼓舞化導，不可變狃榛而文物耶？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兩令，於各社風俗、歌謠，分類詳註為

¹²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至卷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57；1735年原刊），頁94-177。前三卷各卷部份所包含的原住民分類，包括「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等，偶爾甚至附以「番歌」，最後一卷是〈番俗雜記〉，記有關「生」、「熟」番的分類、描述番俗詩文等等。

¹³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123。

番俗六考。於以識我朝重熙累洽，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守土者凜遵謨訓，殫心拊循，毋謂異類而莫之恤。修教齊政，
以昭中外同風之盛，實有厚望焉！¹⁴

這裏可以看到，黃叔瓚作〈番俗六考〉是希望它能對清政府治臺有所裨益。換言之，黃氏是希望清政府能透過他所描述的所謂「番俗」，而達至統治上的最高目標。

若單就「北路諸羅番七」一章來說，其涵蓋聚落範圍包括「阿里山五社、奇冷岸、大龜佛、水沙連思麻丹、木武郡赤嘴、麻咄目靠、挽鱗倒咯、狎裏蟬巒蠻、干那霧」¹⁵等。這些原住民聚落，有的像「水沙連思麻丹社」具有「鱗甲」，有的像「阿里山社」遠在深山，不能通舟，但都歸類在一起。這些原住民聚落是否屬於同一語言，黃著亦不予考究。可以想見，在〈番俗六考〉的分析體系裏，生活習慣各異、物質文化有落差（甚或是語言不同）的不同群體，均可能被放在同一類「番」之中。而這些社之所以被歸類在一起，亦可能與它們在地理上由幾條主要的河道（如陳有蘭溪、濁水溪等）貫穿而致。進而言之，黃叔瓚所描述的並非一個一個具有同一個語言、文化的共同體，而可能是在同一個行政、地理區域劃分的範圍裏，一些原住民聚落之粗略印象。如果我們使用二十世紀的「族群」概念的話，在黃叔瓚的記錄裏幾乎找不到明確的立足點。

自黃叔瓚以後，清人對於日月潭地區的人文知識已經沒有增長。這種情況即使經過了「骨宗事件」、¹⁶「林爽文之亂」¹⁷等等動搖臺灣中部社會的重大事件，清人卻沒有對於日月潭地區進行一些能增進對該地區人文、地理知識的進一步記錄或調查。至嘉慶、道光年間，

¹⁴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94。

¹⁵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119。

¹⁶ 是指在雍正 4 年發生因「水裏湖社番」骨宗不服而清朝出兵討平的事件，史稱「骨宗事件」。關於這一事件，見周璽，《彰化縣志》，第三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1962；1835 年原刊），頁 361-362。

¹⁷ 「林爽文之亂」於乾隆 51 年爆發，因有「水沙連番目」毛天福曾率社眾出而防禦林爽文的徒眾，亂平後得清高宗的接見及賞賜，「水沙連」也被納入亂事平定後的地方防禦系統中，稱「柴里小屯」，屯兵九十名。劉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2），頁 54-55；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古亭書屋，1973；1904 年原刊），頁 376。

發生漢人以官發墾照為依據，進入「水沙連內山」及「埔里」一帶開墾並殺戮當地原住民的「郭百年事件」。¹⁸ 清朝事後派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姚瑩等先後進入水沙連範圍進行調查。¹⁹ 之後，又因漢人「越界侵墾」的事情仍然持續，清政府的在臺官員便更頻繁地進入日月潭地區調查，而有各級官員如臺灣巡道熊一本、淡水廳事鹿港同知曹士桂、閩浙總督劉韻珂等的記錄。²⁰ 雖然這些資料使得清朝對於日月潭地區的地理情況，獲得更詳細的了解；對於該地的人文情況，卻付之闕如。²¹

除了官方的記錄之外，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日月潭地區（包括頭社、水社、貓蘭社、審鹿社、木屐蘭社、福骨社、社仔社）及埔裏盆地（埔裏社、眉社、水眉裏社）因為漢人的開墾而產生大量文字記錄。這些文字記錄均以專為記錄土地開發、買賣、租佃而產生的契約文書為主。雖偶而牽涉當地原住民的經濟狀況（例如經常在契約上寫「化番不諳耕種，不識樹藝」²² 一類的文字），但對於他們的社會、信仰、風俗等，亦無從探求。這種情況，即使是到了光緒年間推行「開山撫番」政策，亦未有所改變。²³

- ¹⁸ 關於郭百年事件，參見劉枝萬，《南投縣沿革開發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8），頁131-132。
- ¹⁹ 鄧傳安，〈水沙連紀程〉、〈遊水沙連記〉，收於氏著，《蠡測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9種，1958；1830年原刊），頁5-7、33-34；姚瑩，〈埔裏社紀略〉，載於《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1957；1829年原刊），頁32-40。
- ²⁰ 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收於丁日健編，《治臺必告錄》，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1959；1867年原刊），頁229-238；曹士桂著、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編，《宦海日記校注》（原名：韻堂公宦海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劉韻珂，〈奏開番地疏〉、〈奏勘番地疏〉，收於丁日健編，《治臺必告錄》，第二冊，頁207-228。
- ²¹ 詳見陳計堯，〈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1815-1934）〉，《臺灣史研究》7: 1（2001年4月），頁81-134，特別是頁89-94。
- ²² 原契係道光29年由水裡社六社化番總通事毛澳、草地主目改旦所立的「招佃」契，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全六冊），第四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52種，1963），頁623-624；轉引自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全三卷），中卷（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頁211-213。
- ²³ 關於日月潭地區契約文書的利用及其研究成果，可參見劉枝萬，《南投縣沿革開發篇稿》；林文龍，《臺灣中部的開發》（臺北：常民文化，1998）；毛隆昌、簡史朗、白宏如，《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種籽村建立計畫——日月村（卜吉社）期末

三、引進「族群」概念

外界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人文知識，要到日本時代才有增進。這是因為臺灣總督府必須對原住民採取最有效統治，對於他們的種種認識，包括社會制度、風俗、宗教、經濟等狀況，便成為重要的業務而著手進行調查。自從明治二十八（1895）年九月開始，總督府之下殖產部門便要求地方政府機關調查舊有原住民行政（理蕃行政）。其後，又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月頒佈詳細的「蕃人蕃地調查事項」。到了明治二十九年（1896）底，臺灣總督府對於原住民的調查便已合併在其「報告例」之中，漸漸地出現「常規化與例行化」的現象。同時，成立「蕃情研究會」，成為交換各地蕃情的資訊網絡。²⁴

在日月潭地區，早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一月便有因應總督府戶口調查的需要，由自稱「頭水六社化番總理」的黃玉振記述的〈化番六社志〉。志中除了有關頭社、水社、貓蘭社、審鹿社、眉社、埔社等社的沿革、遷移之外，還有他們的風俗、戶數、人口數、兵制、租制等描述。其中「風俗」一項云：

六社番耕農器具，略同漢人。至於衣食風俗，則有大異乎人，其衣則以鹿皮為衣，食則以手指為箸，每日餐飧，富者三度，貧者二度。以石盤為砧樁，以木槌為砧杵，想其砧米之際，頗同彈琴之聲，其音韻有清濁高下之分，令人聞之，三月不知肉味，真奇俗也。若其農隙之時，則以搏獸為生業，倘得網獲微獸而返，則自稱為好漢，各番賚酒相賀，敬羨其能，敬賀以後，即將獸頭懸於門前。以八月初一日為新正，自八月初一起，化番男婦老幼各往山中鑽燧改火，候三日之後，各帶新火而歸。是月之內，不論男女聚飲一處，日夜成群結黨，頭插草花，身穿紅衣，攜手同行，足踏手舞，咿咿呵呵，嘻笑唱和，以此為樂，名曰作戲，至九月一日乃止。至於嫁娶訂盟之時，則用牛、酒、布疋送於女家，待三日後，男家自選壯番數人，直到女家，將女前推後挽，過門成親，越日，兩家親戚歡樂飲

報告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1999），以下簡稱《日月村期末報告書》；鄧相揚，〈水沙連地區的拓墾與邵族的處境〉（未刊稿），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臺灣與華南社會（1600-1900）研討會」，1999年3月19至20日。

²⁴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頁40-57。

酒，醺醉各取木棍互相鬥毆，打得二比親戚血流遍身，仆倒於地，自稱親戚至親至美，前俗未奇，此俗更奇者也。²⁵

從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雖然黃玉振仍是沿用舊有寫「風俗」的辦法來描述日月潭地區的原住民，但卻是自黃叔璥以來首次對日月潭和埔里盆地地區的原住民風俗，作如此精確的記錄。文中突顯了「六社化番」（主要是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風俗特色：杵歌、過年及婚嫁。杵歌、婚嫁兩項更以「奇俗」視之，使日月潭地區原住民具有別於他人的「族群元素」。

在同時期另一份關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重要文字記錄——頭社童生莊士杰的〈頭水六社化番風俗資料〉裏，類似的情形亦一再出現。²⁶ 莊著和黃著一樣把頭社、水社、貓蘭社、審鹿社、眉社、埔社等六社一起歸類，也同樣提及六社的沿革、人口等。不過，與黃玉振的描述相比，莊士杰的資料對於該地原住民的各類生活、社會、風俗等狀況更為詳盡，而且都另立新的分類項目如語言、衣服、住家、建築、飲食、漁獵、農牧、算數、曆日、遊戲、婚姻、法律等。這要比黃玉振著重報導「六社化番」的婚姻及過年，範圍更廣。在莊士杰的資料之中，甚至首次出現有關「人種性質」的分類：

蓋聞，頭水六社之番，本地所產者也。其性澆漓難測，其質野俗不文。否則何以歸化已久，依然尚夫皮冠野服，而不著夫衣冠，講夫詩書，敦夫禮義也。²⁷

只是，莊士杰對於當地原住民，仍是以既有的「化外之民」的概念來理解。至於其他用以識別族群的概念，莊士杰則似乎全無認識。這顯然是與來自外界的觀念與以「族群」來作分類的辦法有關。

²⁵ 見黃玉振，〈化番六社志〉，收於《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3；1896年原刊），頁131-134，特別是頁133。

²⁶ 莊士杰，〈頭水六社化番風俗資料〉，收於《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頁135-138。

²⁷ 莊士杰，〈頭水六社化番風俗資料〉，頁135。

四、人類學對「化蕃」的分類

對原住民採用新的分類法，是隨日本軍隊來臺的人類學者們。他們憑借個人的人類學修養，為臺灣原住民套用新的分類辦法——「種族」、「族群」等——以取代過去純政治確定的「生／化／熟番」的分類法。這些人類學者包括曾經到過日月潭地區做調查、早期的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鳥居的助手森丑之助。

伊能嘉矩是三者之中較早造訪日月潭的調查員。該調查計畫是與總督府對「蕃人」的教育法的調查研究有關。²⁸ 伊能氏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九月從埔里出發，經過新城（舊審鹿社址）、日月潭的石印、頭社，然後再往集集方向去。²⁹ 在日月潭地區逗留短短的兩天裏，採訪了有關「水社蕃」的語言、風俗、生活等方面。從伊能嘉矩的描述資料裏，可見他不斷地比較「水社蕃」與其他地區原住民的風俗、語言及生活情況。例如，他的調查指出水社、頭社、貓蘭社和審鹿社均與「埔、眉兩社有所不同」。至於有何不同，伊能嘉矩也沒有進一步解釋。³⁰ 又例如在建築的形式上，伊能嘉矩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屋內中央設有三石灶，屋角擺設一、二張床。屋內火爐上方懸吊著火棚，牆壁上有棚架，這種構造和北蕃部落內所見的相同。像靠近南邊的北蕃，也在屋內擺設木造的「平椅」讓家人坐。屋外不另設穀倉，只是把穀類收於屋內一角。³¹

同時，他也觀察到「水社蕃」在語言上，有可以作為族群識別的準則：

……頭、水社的族人固有語言，同族之間講蕃語，和漢人講漢語。³²

²⁸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頁 100-101。

²⁹ 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頁 215-226。

³⁰ 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頁 217。

³¹ 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頁 221。

³² 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頁 225。

可見，雖然伊能嘉矩在他的踏查日記裏，未有對該地原住民有「族」的稱呼，但已把他們作出了初步的族群分類。

其後，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發行的《臺灣蕃人事情》裏，伊能氏等便已把全臺原住民歸類成爲八大族，日月潭地區的「水沙連化番」則被分類在 Vonum 族之下。但以「水沙連化番」五社，即水社、頭社、貓蘭社、審鹿社和埔社爲一類（「番」），同屬 Vonum 族之下，而眉社則應歸類到「Ataiyal」族。³³ 目前只能說伊能氏的族群分類基礎，其依據是「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言語的異同及歷史的口碑」。至於每一個群體的族群分類爲何如此，則因伊能氏未有說明而未能確定。³⁴

其實，如果把伊能嘉矩的踏查日記與黃玉振、莊士杰的記錄作一比較，便不難發現伊能氏的研究基本上是整理既有的記錄，而非以田野觀察、採訪作爲第一手資料。就以項目而言，伊能嘉矩在踏查時所調查的部份依次包括：新年的習俗、房屋、飲食、衣服、知識程度（實際即是指算數）、婚姻、喪葬、律法、遊戲、語言等。名目及基礎內容上均與莊、黃二人的記錄無大出入。伊能嘉矩的採訪資料，也基本上是在既有文字資料的架構下作補充資料而已。³⁵ 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從伊能嘉矩日後的論著中找到蹤影。伊能嘉矩與他的計畫合作人粟野傳之丞，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共同著述的《臺灣蕃人事情》，便是一例。在論及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時，該書仍沿用「水沙連化番」的稱謂，除了引用一些原住民的口述資料（「口碑」）之外，便基本上是以清代文字記錄爲主要的論述支柱。³⁶ 換言之，整體上伊能嘉矩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分類基礎，並沒有突破清代文字記錄的框架，反而有硬著把這個框架與族群概念互相套用的情況。

另一位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五月及八月經過日月潭及埔里地區，順道對當地的原住民做調查。³⁷ 在明治三

³³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頁 26-27。

³⁴ 關於伊能嘉矩的分類，見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頁 102-106。

³⁵ 類似的批評，也可以從另一位日本人類學家森丑之助的言論中看到，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臺北：遠流，2000），頁 527-529。

³⁶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頁 26-27、31-40、185-198。

³⁷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臺北：遠流，1996），頁 350-351、365-368。

十三年（1900）七月鳥居氏的一封信裏提到：

Sau [Saou]（水社化蕃）所謂的水社化蕃，主要的是居住於水社湖畔和頭社。他們在湖上駕獨木舟往來，看到他們就感覺愉快而且有趣。我在這兒停留十天調查，一共測定了二十八名化蕃的體質。（採自楊南郡翻譯部份，[]號為筆者參考法文原文加註）³⁸

其後鳥居氏又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的一篇報告中，對於「水社化蕃」有更詳細的描述：

水社湖的周圍一帶，住著漢人所稱的「水社化番」，這一支蕃族自稱 Sau[Saou]，共有六社，…… Sau[Saou] 族的人口大約五百多人。他們常在水社湖上駕獨木舟互相往來。

現在舉出風俗一例：男子將額頭上的頭髮分出部分向後梳，用一條紅色帶子束緊，其餘的頭髮讓它自然垂到肩膀上，因為垂髮末端剪得很整齊，所以男子的髮式，很像日本劇場裡所看到的，正巡訪各地修練武藝的「宮本武藏」那個樣子。胸前斜掛著一個麻袋，兼做為束身帶，下體部位也掛著一個同型的，體積稍大的麻袋，仔細一看，麻袋剛好覆蓋在遮陰部的一條短黑布條上。到外界的時候，有的人穿上皮外衣，像日本的「陣羽織」一樣，也有人穿古式漢服。

女子的髮式與男子不同，她們把頭髮分為兩綑梳到後腦束起來，再把它盤繞在頭上。女子上身只穿著一件黑布「半體衣」，裁剪得很短，只覆蓋到乳房下面一點點而已。下身用兩塊布從左、右兩邊圍繫起來，當做腰布。男女都赤著腳，有時候男子會穿布農[Bounoun]蕃及阿里山蕃那樣的皮底鞋。

Sau[Saou] 族會取楠仔樹幹製造獨木舟，來往於水社湖上。

現在簡略地介紹邵[Saou]族語，無論是語詞或語法，都屬於馬來語系統。……（採自楊南郡翻譯部份，[]號為筆者參考法

³⁸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頁 350-351。筆者曾參考鳥居龍藏原法文版，文中所用以稱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者是「Saou」，而非翻譯者楊南郡所用的「Sau」，故筆者在引文及正文中均加以注明。關於鳥居龍藏原法文版，見 R. Torii, "Etudes Anthropologiques Les Aborigènes de Formose,"《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部紀要》第二十八冊第八編（東京，1910），頁 13。

文原文加註)³⁹

與伊能嘉矩明顯地相反的地方是，鳥居龍藏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觀察和論斷，都是基於他的田野資料及人類學的訓練。所以，在鳥居龍藏的描述裏很少看到像伊能嘉矩般的文字資料整理。而具備馬來語及人種學訓練的鳥居氏，更是以人體特質、語言加上外觀穿著的不同來作判斷。鳥居氏更是第一位以「Saou」——該地原住民的自稱，來稱呼這些傳統上的「水社化番」。「Saou」便在歷史記錄上第一次出現，成為「水社化番」的「族」名。鳥居龍藏除了用文字描述之外，也利用了近代影像技術，大量拍攝有關臺灣原住民的外表與體質。雖然他日後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所提出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時，強調他的分類是基於與伊能嘉矩相約的標準——「土著的風俗語言、傳承、習慣」等而分類；但是，這些外觀的觀察、第一手記錄、影像、語言等的標準，似乎在鳥居龍藏的思考架構裏，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對於「水社化番」自稱「Saou」這個人稱的自我認定，使人數極少的「水社化番」一躍而為「Saou 族」，甚至與「埔蕃」、「眉蕃」有別，獨立地躋身於鳥居氏所分類的臺灣原住民「九族」之內。⁴⁰

第三位早期曾經到過日月潭地區調查的日本人類學家，便是森丑之助。他與鳥居龍藏一起，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經過日月潭及埔里地區。森氏與鳥居龍藏一樣，也是基於他的田野資料和利用近代影像技術，作為第一手資料。不過，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分類，森丑之助卻作出了與伊能嘉矩、鳥居龍藏不一樣的論斷。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初發表的〈森丙牛氏談話記錄〉，森氏表達了他對於「水社潭」原住民族群分類的看法：

……外界也把水社潭水社和頭社的蕃人，當做伊能嘉矩氏所謂 Vonum（即 Bunun 蕃）的一支。其實，這一小群被稱為化蕃

³⁹ 鳥居龍藏，《探險臺灣》，頁 365-367。

⁴⁰ 鳥居龍藏，《探險臺灣》，頁 50-129。有關鳥居龍藏的臺灣原住民影像記錄，見鳥居龍藏寫真資料研究會編，《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第三部寫真（東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1990）；其中部份見於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跨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臺灣原住民》（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4）。

的蕃人不是布農 [Vonum] 蕃。伊能氏在頭社訪問時，聽到社蕃說，他們是「頭社的 Vonum」，才誤認那邊的化蕃是布農 [Vonum] 的一支。照我看來，只有頭社屋式是布農 [Vonum] 式，頭社和水社的語言和習俗比較接近阿里山蕃語言和習俗，甚至布農 [Vonum] 蕃的口碑傳說，也明白地說，水社化蕃和阿里山蕃是同族。化蕃自稱 Thao，我想 Thao 是阿里山蕃的自稱 Tsou 轉訛的。（採自楊南郡翻譯部份，[]號為筆者加註）⁴¹

森丑之助顯然認為構成一個族群的成份，語言、口傳和習俗要比外觀的建築風格、特色更為重要。他並以此作為對其族群界線界定的重要標準，而使他經過比較之後，作出「水社化蕃和阿里山蕃是同族」的結論。雖然森氏在此以後並沒有更詳細的專論來論證他的看法，但這種看法，在此後森丑之助另一份編著《臺灣蕃族圖譜》（1915年訂稿，1918年才發行）中再次出現，「水社化蕃」被稱為「Tsou 族 Sau 蕃」。⁴²

自此以後，人類學界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便有了至少三種不同的族群分類法，其中以森丑之助的分類最為普遍。例如，臺灣總督府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行的英文版《臺灣理蕃報告》（*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中，雖然未有正式提及日月潭的原住民，但是實際上便採用了森丑之助的分類，把三張與日月潭原住民有關的照片放置在 Tsou [Tsou] 族裏。⁴³ 亦有完全不介入這三種分類討論者，如成田武司編的《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中，便沒有提及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所屬的種族。⁴⁴ 不過，某些研究有時甚至連作出分類的研究者本身都不曾確認。像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於明治末、大正初年所作的《蕃族調查報告書》中，雖把「石印化蕃」編入大正八年（1919）刊行的《武崙族前篇》，但卻在全篇開首的「北部

⁴¹ 森丑之助，《生蕃行腳》，頁373。

⁴²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實為森丑之助）編，《臺灣蕃族圖譜》（全二卷）（臺北：南天書局，1994；1918年原刊），第一卷，頁3；第二卷，第37、44-46及第60版。

⁴³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Taihoku, Formosa,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1911), p. 38.

⁴⁴ 成田武司編，《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東京：成田寫真製版所，1912）。

武崙族分布圖」中，把水社、頭社及日月潭畫在「武崙族」的族群分布界線之外。這明顯地是沒有肯定的把「石印化蕃」納入武崙族的一支。而且，該書只在其中的第十二章「教育及模樣數色彩之觀念」裏，以「參考」的形式，把「石印化蕃」的各種與族群有關的事情（包括其概況、沿革、季節行事、宗教、出產、結婚、埋葬、缺齒、家族、歌謠及踊、傳說等）列出，而並非把「石印化蕃」的內容獨立成章。⁴⁵ 又如在昭和初年藤崎濟之助的《臺灣の蕃族》，雖然認為「石印化蕃」是屬於 Tsou [Tsou] 族的一支，但以其「石印化蕃」之名，而並列於「生蕃」、「熟蕃」之外的「歸化蕃」。⁴⁶ 同時期的鈴木作太郎的《臺灣の蕃族研究》，則把「石印化蕃」或「水社蕃」作為在普通行政區管轄之下的 Tsou [Tsou] 族。⁴⁷

如果我們再仔細的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後來有關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研究者，似乎沒有繼續對該地住民有更深入調查和研究。他們有的利用從前的研究，便已作出論斷。甚至有附會一些新的「口碑」。其中最流行的是南投廳於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日月潭》一書所刊載的一則歷來首度談及「化蕃」來源的口傳資料，而這則把事件發生時間追溯至「乾隆四十五年」的「口碑」，很快便在大正八年（1919）刊行的《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裏出現：

……有一次嘉義大埔之生蠻四十餘名在巒大狩獵，為了一頭被認為是白鹿的[動物]而追躡牠，漸次來到西北面，最後於水社大山，失去其[那被認為是白鹿的動物]蹤跡。徘徊了三日，發現此湖[日月潭]。乃詳細查勘其地形。歸社後，向酋長等述說真為上天賜與之樂土。遂決定其中一部份人移住之事。其年十月有二十四戶男女八十餘名移來到今之卜吉埔及初狩崎（土名吐崙尾）……（原文日文，由筆者意譯標點）⁴⁸

雖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研究員並沒有確定「嘉義大埔之生

⁴⁵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9），頁 192-196；及卷首「北部武崙族分布圖」。

⁴⁶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東京：國史刊行會，1931，增訂版），頁 26-30。藤崎顯然仍是把清代的「生／化／熟」番的歸類法套用在二十世紀的「族群」分類之中。

⁴⁷ 鈴木作太郎，《臺灣の蕃族研究》（臺北：臺灣史籍刊行會，1932），頁 5。

⁴⁸ 南投廳編，《日月潭》（南投：南投廳，1916），筆者未得見其原文，只從《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頁 192-193 中找到轉載。

蠻」所指的是哪一個族群，而且把「石印化蕃」模糊地歸類到「武崙族」(Vonum)去，但卻因為「嘉義大埔」就在阿里山附近，而使得對於把「水社化蕃」歸類為「Tsuou [Tsou]族」的分類法，找到了支持點。其後的藤崎濟之助便是以這一點而認定「水社化蕃」為Tsuou [Tsou]族。⁴⁹至於對這一種說法存疑的學者來說，卻亦可以從Bunun族的口碑中找到支持。⁵⁰

總而言之，日治時期人類學界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認識，特別是用以識別族群界線的知識，一直停留在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的時代，沒有進一步的增長，也沒有更深入的田野調查，反而有更多的附會。這種情況，與同時代行政體系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分類，有密切的關係。

五、行政體系的分類

綜觀整個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在一般的民政裏，對於「種族」的分類是與行政上把人口以國籍與地緣分類有密切的關係。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進行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及《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也是日本殖民地政府總督府對全臺灣所作的第一次戶口調查，第一次出現有「種族」的分類，所包涵的類別雖是指以其常用語言而分辨的三大類別，但行政上的國籍與地緣分類已經十分明顯：第一類、日本殖民母國來的「內地人」；第二類、「本島人」，其中又分為「漢人」、「生蕃」、「熟蕃」三種，「漢人」包括原從福建、廣東和其他地區來但自日本領臺以來仍然留居臺灣的人士，至於「生蕃」、「熟蕃」，則是臺灣原住民而視其歸順與否，分別歸類到「蕃地」行政區和非「蕃地」的一般行政區域內；第三類為「外國人」，包括來自對岸的「清國人」和其他國籍的人士。⁵¹而在地方州廳上所做的戶口調查，如明治三十九年(1906)

⁴⁹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頁27-28。

⁵⁰ 前島信次，〈日月潭の珠仔嶼〉，《民族學研究》2: 2 (1936年4-6月)，頁191-213，特別是頁196-197。

⁵¹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東京：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8)，頁8-9；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東京，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頁10-11。

二月二十二日南投廳長公佈的「戶口調查規程施行細則」中所列「戶口實查簿」，便甚至連「種族」一欄都沒有。⁵² 到大正九年（1920）所進行的《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對於「種族」一項，則比《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有關的界定，更加單以國籍與地緣為標準，而非以住民的各所屬族群作分類基礎。⁵³

既然在全臺的人口統計數字裏無法找到「邵族」或「水社蕃」，我們便需要檢討日本治臺期間另一個對臺灣原住民採取分類的行政系統——「蕃地」行政區裏，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分類。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自從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行的英文版《臺灣理蕃報告》中，便開始有以不同的族群為分類基礎的戶口統計刊行。⁵⁴ 可是，該報告書中並未有把各族各「蕃社」詳細列出，故此也很難利用來作進一步的分析。到大正二年（1913）南投廳所做的大正元年（1912）《南投廳第三統計摘要》，第一次出現了該廳管內的「蕃社」。雖然該統計書對於原住民已經有「種族」、「部屬」與「社」的詳細分類，不過其分類中便不見「水社（化）蕃」、「頭社（化）蕃」或「石印（化）蕃」。⁵⁵ 其後於大正四年（1915）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的《蕃社戶口》、大正七年（1918）南投廳所編的《南投廳第一統計書》與及昭和十一年（1936）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印的《高砂族調查書》，亦是如此。⁵⁶ 也就是說，在日治時代的「蕃地」行政的統計資料裏，是找不到「水社（蕃）」或「頭社（蕃）」的；這兩個社和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根本就不在「蕃地」行政的管轄範圍裏。

雖然目前仍然未有確實的研究提供日治時期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被分類的族群類別，他們卻很可能是在「熟番」的記錄之下。這是因為

⁵² 《南投廳報》，第三百八十號（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頁 163。

⁵³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記述報文附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頁 4-7。

⁵⁴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p. 43.

⁵⁵ 南投廳，《南投廳第三統計摘要》（臺北：南投廳，1913），頁 38-39。

⁵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蕃社戶口（大正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6），頁 12-21；南投廳，《南投廳第一統計書（大正七年）》（南投：南投廳，1920），頁 18；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編：戶口、內臺人との接觸、衛生》（臺北：南天書局，1994；1936 年原刊），頁 21-22。

他們所在的日月潭地區，在同治十三年（1874）以後便被納入臺灣的一般行政區（即當時「生番」界外的清政府領地）管轄之下，屬「埔裏廳」。⁵⁷ 而在日治時代的一般行政區，其原住民的行政分類仍沿襲清代，以「熟番」來記錄。關於這一點，似乎可以在昭和初年地方州郡的統計資料中得到支持。在昭和初年水社、頭社等所屬的「魚池庄」管內的戶口統計裏，其中「本島人」一項內的「生蕃」、「熟蕃」便值得我們再思考。這些數字經過整理之後便如下表一：

表一 昭和三年至六年魚池庄管內「生番」、「熟蕃」人口數

年度	熟蕃人口數		生蕃人口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昭和三年	51	240	1	17
昭和四年	67	73	1	17
昭和五年	50	226	---	---
昭和六年	47	220	1	13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戶口（昭和三年末至昭和六年末）》（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29-1932），歷年關於「新高郡魚池庄」部份。

上表所述的「魚池庄」管內，是包括整個日月潭周邊的範圍。雖然這些數字的增減可能與實際的人口遷移、出生、死亡無關，而或許是因為地方行政區域改編的結果，但仍具參考價值。表一中顯示「魚池庄」管內曾有「生蕃」，但最多只有一戶十七人。至於「熟蕃」，除了在昭和四年（1929）明顯的減低至只有七十三人之外，其他年度均有達兩百二十人或以上。這與日治初期黃玉振、莊士杰所分別呈報的三百六十八人及三百六十二人，較為吻合。⁵⁸ 另一方面，以一向被歸為「熟番」的「平埔族」——即於十九世紀遷入的原住民⁵⁹——均集中在埔里而非日月潭地區推斷，上表中所示的「熟蕃」該係指日月潭地區的原住民。不然，日月潭地區的原住民數目便會更少。故此，

⁵⁷ 關於「埔裏廳」在 1874 年以後的範圍，見「埔裏廳圖」（約成於光緒 14 年以後），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地輿全圖》（臺北：編者，1963，臺灣文獻叢刊第 185 種），頁 48-50。

⁵⁸ 黃玉振，〈化番六社志〉，頁 134；莊士杰，〈頭水六社化番風俗資料〉，頁 135。

⁵⁹ 關於平埔族的移入，見劉枝萬，〈南投縣沿革開發篇稿〉，頁 28-95。

筆者認為在日治時代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身份認定，是被臺灣總督府歸類到「熟蕃」的項目之中，而非像鈴木作太郎所認為「普通行政區管轄之下的 Tsuou [Tsou] 族」。不過，在「熟蕃」的類別之下，便沒有更細緻的族群分類。所以，作為「熟蕃」的日月潭地區原住民，卻未見有在官方編制下的族群識別。

六、觀光與「化蕃之由來」

既然日治時期人類學、官方行政系統等各方面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族群分類如上述般的那麼不可肯定，那末「邵族」是「鄒族」一支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雖然以目前淺薄的資料，顯然是不足以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但只要我們檢討一下這些資料，便會發現「邵族」是「鄒族」一支的看法，可能是與日本時代日月潭地區的觀光事業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從清初臺灣納入版圖以來，日月潭地區的風光便已享負盛名，不單被周鍾瑄《諸羅縣志》列為極具特色的「諸羅六景」之一，⁶⁰ 更被藍鼎元認為：

萬山之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往來，仇池公安足道哉！武陵人誤入桃園，余曩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遊，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倫浹其肌膚，使人人皆得宴遊焉，則不獨余之幸也已。⁶¹

藍鼎元以後，挾著清政府的勢力慢慢的擴充，便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日月潭，不少人甚至留下詩詞。⁶² 可見其盛況之一班。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因為清政府曾立碑名是禁止漢人越界侵墾，⁶³ 要進入日月潭遊玩，想也需要政府批准，或像藍鼎元般的因公務而能「挾軍

⁶⁰ 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第一冊，頁18。

⁶¹ 藍鼎元，《東征集》，頁86。

⁶² 例如，於雍正十年來臺的吳廷華，雖不知道他是否到過日月潭，但已有兩首詩歌頌該地。見劉枝萬，《臺灣日月潭史話——附霧社事件》（埔里，1951，油印本），頁9。

⁶³ 那是道光五年，立有「奉旨永禁開墾」碑二個，一在集集汛，另立一碑在烏溪，見姚瑩，《東槎紀略》，頁35。

士以來遊」。故此，這些文人雅士能進入日月潭地區的機會與時間，恐怕不多，更不能與後來的觀光事業相提並論。

日月潭地區是要到日本時代才發展成為觀光重點，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一九一六年四月蓋成專供觀賞湖光山色之用的一棟旅館——涵碧樓。劉枝萬對於涵碧樓曾經有下面的描述：⁶⁴

當臺灣完全被日人平定以後，訪問日月潭的高官貴人騷人墨客，更一天一地多起來，日月潭也隨之變成了殖民地味道的遊覽景勝。所以在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四月一五日，潭邊蓋起了一座日式二層木房，名叫涵碧樓。翌年八月大地震時，許多房屋都遭到毀壞，日月潭的湖水也自西岸衝到東岸，然而，涵碧樓卻沒有遭到損傷。這年十二月末和次年一月五日的大地震，也沒有使它改了樣子，它依然和從前一樣地俯瞰這仙境。後來日本皇族到臺灣遊覽的時候，曾住過這裡，這使它的地位和聲望，好像又比從前高了許多。……

可以想見，在一九一〇年代涵碧樓成為日月潭地區的觀光事業之重點，為旅客提供住宿服務，並已經進入具有一定規模的階段。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涵碧樓仍然是該地區的重要旅館。⁶⁵

除了涵碧樓之外，日本時期日月潭地區也有在開發其他的觀光資源。其中包括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日月潭畔與珠仔山上植樹，並在珠仔山上頂部修建小屋以供遊憩之用。至一九三一年甚至把小屋改建，成為一所神社——玉島神社。⁶⁶ 雖然其後有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但沒有把神社淹沒。日月潭的觀光事業反而隨著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涵碧樓的修建而繼續維持。⁶⁷

在涵碧樓等設施發揮觀光功能的同時，日月潭地區的觀光事業也透過其他途徑發展。其中，出現了近現代觀光事業最突出的產品——

⁶⁴ 見劉枝萬，《臺灣日月潭史話》，葉 35-36。

⁶⁵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栞》（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9），頁 60。

⁶⁶ 見劉枝萬，《臺灣日月潭史話》，頁 31-33；劉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0），頁 230。

⁶⁷ 關於涵碧樓與神社在水力發電工程之後的描述，見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栞》，頁 60；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日月潭發電事業の大要》（臺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1934），頁 1-2。

明信片。這些明信片，每一張並附有日文標題，有的是以日月潭山水風光為主，有的則以當地原住民的生活面貌（如原住民部落、獨木舟、杵音等）作題，有的明信片甚至有原住民穿著「傳統」服飾，擺出造型。⁶⁸ 與日治初期人類學家為了記錄而拍攝的照片不同的是，這種相片是作為旅遊紀念用的，使旅客能把曾經遊歷的「風光」帶回去。除了明信片之外，日月潭的「特色」也透過其他方式來展示，例如原住民的杵音，成為一九二〇年代外車埕車站與水裡坑車站的風景戳內容。⁶⁹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末，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出版的一部旅遊手冊，更載有原住民婦女表演杵音時的各式收費。⁷⁰

這些日月潭的觀光事業項目之發展，似乎亦衍生出一個重要的環節來：「化蕃」的由來。因為正如前述，在觀光事業的發展之下，日月潭地區亦變得觀光化。而當地的原住民更成為觀光事業不可或缺的一員，不單是外表造型，甚至是音樂之類富有「民族特色」的東西，都變得非常有觀光價值。故此，觀光業者及支持他們的政府便或需要把當地的原住民介紹給觀光客，並要解答為何那裏會有「蕃人」。

對於「化蕃」的由來，南投廳政府自一九一六年（涵碧樓落成的同一年）以來，便有上述關於「化蕃」由來的「口碑」，認為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是來自「嘉義大埔之生蠻」。雖然我們無法證實這些口傳資料的記錄及整理過程，但卻可以知道這些口傳的出現，是在一九一〇年代中期，而且不斷地在演變、附會。例如，這個「化蕃」由來的「口碑」，在同年由臺灣總督府出版的《臺灣名勝舊跡誌》亦有收錄。⁷¹ 其後，這個說法不斷地流佈於其他的官方文獻資料裏，像上述的《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便是一例。而作為臺灣總督府介紹臺灣全島發展的手冊《臺灣事情》（大正五年〔1916〕創刊），亦於大正十年（1921）出版時，更新過去已經用了五年的簡單描述，

⁶⁸ 莊永明編，《臺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地誌繪集》（臺北：遠流，1996），第25圖背面明信片；這些明信片包括「（臺灣）日月潭全景」、「（臺灣）日月潭水社化蕃の部落」、「（臺灣）日月潭涵碧樓」、「（臺灣）日月潭の獨木舟」等；又見「（臺灣）日月潭情調杵の音」（見圖1），收於《新故鄉》，2000春季號（2000年3月），頁2。

⁶⁹ 莊永明編，《臺灣鳥瞰圖》，第25圖背面風景戳。

⁷⁰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彙》，頁59。

⁷¹ 杉山靖憲編，《臺灣名勝舊跡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358。

改為引用類似的「口碑」。⁷² 至一九二〇年代，這些總督府的出版品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由來傳說已經越演越烈，幾乎是在肯定他們來自嘉義大埔的山上。⁷³

但要把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說成是 Tsou [Tsou、鄒] 族，關鍵是在於一九二〇年代，其來源卻可能是一塊聳立在日月潭畔的「化蕃之由來」木牌。這塊木牌的位置，卻亦剛好是「化蕃」婦女表演杵音的地方。這個木牌何時聳立？目前的資料不足以確實回答這個問題，在烏居龍藏踏查時期所攝的「杵音」照片中，並沒有木牌聳立在旁。⁷⁴ 但從上述一張約大正十二年（1923）的「（臺灣）日月潭情調杵の音」明信片裏面，卻便已有一位原住民婦女站在一塊「化蕃之由來」木牌旁。另一張刊於昭和六年（1931）的《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照片中，亦隱約可見有一塊「化蕃之由來」木牌，年代亦是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⁷⁵ 筆者從一份昭和十年（1935）的《臺中州要覽》之中，更發現一張內容可能類似的照片，其年代卻應早至大正十年（1921）前後。⁷⁶ 筆者暫時就以大正十年（1921），來作為這塊木牌的創始年代。

雖然不太能確定這些照片中木牌的內容，但在另一張昭和六年（1931）的明信片裏，我們可獲得「化蕃之由來」木牌清楚的內容：

化蕃之由來

距今約二百四十餘年前，靈元天皇之時代天和元年春，原嘉義廳下後大埔 母訥社（ツオ才）蕃丁二十四人，因在八通關山及巒大山狩獵時，追蹤一頭白鹿，該白鹿往東北方向逃走，依其足跡追來時發現本潭而移住。

⁷² 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創刊版），頁 19-20；《臺灣事情》（大正九年版），頁 24-25；《臺灣事情》（大正十年版），頁 32-34。

⁷³ 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六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1931），「名所舊蹟」部份。

⁷⁴ 見烏居龍藏寫真資料研究會編，《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所藏烏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カタログ》第三部寫真，Plate 192。見圖 2。

⁷⁵ 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東京：新光社，1931），頁 301。見圖 3。

⁷⁶ 臺中州編，《臺中州要覽（昭和八年事實）》（臺中：臺中州，1935），頁 191 前。見圖 4。

現戶數二十七戶 男四十七名

女三十六名

昭和六年四月⁷⁷（原文日文，由筆者意譯標點）

從木牌的內容可見，雖然作者把年代定得更早（天和元年為西元1681年），而非以前的「口碑」所指的「乾隆四十五年」（西元1780年）。但他不單把原來含糊的「嘉義大埔之生蠻」說成非常準確的「豬母吶社」（即特富野社），更在其後註明族群別——（ツオ才）[Tsuoo，即鄒]。另外，也把原來「一頭被認為是白鹿的[動物]」，肯定為一頭「白鹿」。一則「追白鹿」的傳奇，便開始定型。

筆者對於木牌的作者沒有考究，但木牌原文是以日文書寫，想著者若非日人，便必是通曉日文的漢人。從文字之間可見，這塊木牌的著者顯然是以大正五年（1916）的「口碑」，再附會臺灣總督府對於嘉義山區的原住民之族群識別定義，從而構成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是Tsuoo [Tsou] 族這一說法。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著者或受到森丑之助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森氏的有關言論，主要是為總督府「蕃地行政」而做的調查，且均由總督府出版而形成某種權威，並容易為鼓勵日月潭觀光事業的官員所利用。⁷⁸

而從上述的數張照片與明信片之中亦發現，木牌的年份幾乎每一張都不一樣（有大正十年、十二年，昭和六年、九年）。故此，這些木牌很可能是每年更換的。也就是說，「化蕃之由來」木牌與過去漢人為了記錄當地重要事情的來龍去脈而立的石碑不一樣，它明顯地是為了每年都會慕名而來的觀光客「認識」當地的原住民，並把這種知識帶走而設的。

要肯定「化蕃之由來」木牌的影響，當然一定要有更多的田野資

⁷⁷ 明信片載於《新故鄉》，2000春季號（2000年3月），頁19。見圖5。類似的文字記錄也可以從另一張昭和九年的明信片裏看出，見「日月潭的婦女」（明信片），不著撰者，《臺灣原住民群像（I）》（明信片）（臺北：立虹出版社，1998）。見圖6。

⁷⁸ 這一點可以從楊南郡所整理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的出版目錄中看出。根據這些目錄，伊能嘉矩十四份有關臺灣原住民的專書裡，只有三份由總督府所出版（其中只有一份由蕃務本署出版）；鳥居則一份都沒有；森卻曾有十一份專書，其中七份是總督府所出版或收藏，而七份之中又有六份是蕃務本署所出版或收藏。見楊南郡所整理之「附錄」，載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頁631-632；鳥居龍藏，《探險臺灣》，頁437-442；森丑之助，《生蕃行腳》，頁639-640。

料支持。但這一塊木牌的出現，筆者認為是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每一位到過日月潭的旅客，只要曾去過日月潭畔觀賞原住民婦女的杵歌表演，便一定可以看到這塊木牌。而無論這個「口碑」是否符合真實，這一塊木牌卻肯定扮演著傳達知識的角色。而且，對於觀光客或甚至是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而言，這塊木牌所能傳達的知識，就要比諸多的遊覽手冊中的描述來得更直接。而雖然我們不容易去評估「化蕃之由來」木牌的影響，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完成了建構「邵族」是「鄒族」一支這種看法的重要一步。

在此以後的出版品之中，竟也出現了類似的記錄。例如，昭和三年（1928）由南投的青年會所發行的小冊子《日月潭》便云：

一百五十年前，即在支那[中國]之乾隆四十五年之前，此湖水周圍無人居住。有一次嘉義大埔之生蕃（ツオ一族）四十餘名在巒大山狩獵，為追躡一頭白鹿而漸次來到西北面，最後於水社大山，失去其[白鹿的]蹤跡。徘徊了三日，發現此湖[日月潭]，大喜。乃十分詳細地查勘其地形。歸社後，向酋長等述說真為上天賜與之樂土。遂決定其中一部份人移住之事。其年十月，有二十四戶男女八十餘名，移來今之卜吉及吐崙尾……⁷⁹（原文日文，由筆者意譯標點）

這明顯是與上述南投廳於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日月潭》一書所載的幾乎一樣，不同的是多了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加以族群的分類，並且套以「ツオ一族 [Tsuou]」的族名。而且，也跟「化蕃之由來」木牌一樣把原住民所追蹤的定型為「白鹿」。其後，昭和六年（1931）出版的《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有以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來自嘉義大埔「猪母吶社（ツオオ）[Tsuoo]」，而《臺灣事情》亦於昭和七年（1932）版開始，以「化蕃」為「ツオ一族 [Tsuou]」。⁸⁰ 可見，這塊「化蕃之由來」木牌的出現，極可能使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族群識別問題，加添了更多的附會。

⁷⁹ 轉引自前島信次，〈日月潭の珠仔嶼〉，頁 194-195。

⁸⁰ 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頁 300-302；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昭和七年版），頁 536。

七、結論

綜觀上述所論，在還沒有族群概念的清代，日月潭地區人文景觀記錄裏日月潭與阿里山地區之間，是明顯地被分開來看待的。到了族群分類開始建立的日本時代，日月潭地區原住民也進入被分類的階段。不過，對於「邵」的族群分類與認識，卻受到不同層次的社會成員不同的解讀，而出現不同的說法。首先，來自人類學的分類在日治時期，都不曾確定。早期的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對於該地區原住民曾經作出三種不同的分類別：有與布農同族，有自成一「邵族」，有屬於阿里山鄒族的一群——「鄒族邵蕃」。這三種分類法，在日本時期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裏，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況，也沒有更深入的田野調查加以釐清。而行政部門對於當地原住民的分類，卻又與人類學者大相逕庭。行政部門以其位處平地，又自清末以來隸屬一般行政區而不被臺灣總督府編入「蕃地行政區」部份的「生蕃」。從戶口資料中可以推測，日月潭地區原住民是可能被編入「熟蕃」的人口統計裏。換言之，「邵族」是「鄒族」的一支的說法，在日治時代的政府與學術界均未成型。

把他們看為「鄒族」一支的源頭，卻是來自日治時期發展的日月潭地區觀光事業。特別是自大正五年（1916）以來，日月潭出現「追白鹿」的「口碑」，並經過附會而成為在大正十年（1921）左右出現的「化蕃之由來」木牌，使得當地原住民的由來具體地化為文字，介紹給來自外地的觀光客人。所以，當人類學者們還在以不同的類別來處理日月潭原住民的族群分類的同時，社會民眾與外地旅客便已經接觸經過層層附會的說法，以致可能認為「邵族」是「鄒族」一支。

上述的討論，並非是爲了否定在古代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與阿里山地區原住民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也不是要漠視筆者「鄒族」的 Ino 與大哥的認識，更不是要漠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口述傳統與智慧。但從日治時代的人類學關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研究來看，各方的理論說法各異卻均非有深入的調查作為後盾，實在有釐清與追問的必要。而在「追白鹿」的故事發展裏，「白鹿」的本身從不確定變為肯定，原住民從「生蠻」、「蕃人」而變為「鄒族」，原住民的原居地從「嘉義大埔」變為「嘉義大埔猪母吶社」等等，以及「口碑」出現

的年代等問題，不禁使人懷疑「口碑」本身被採集的背景、動機與過程。

另一方面，在「鄒族」的世界觀裏，存有對於居住在日月潭的原住民——「Svatanv」之認識。到底「鄒族」與「邵族」之間歷史上的關係如何，目前還是一個謎。要解開這個謎，恐怕不能再只以片段的口傳來作準，而應以更多的資料、田野調查來作佐證。而在解開這個謎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鄒」人把「Svatanv」看成「鄒 Svatanv 群」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同樣地，當「邵族」是「鄒族」一支的知識出現在日月潭地區時，同樣的知識也會回流到族人的社會之中。回流的辦法可以是透過教育，或是透過觀光事業所產生的認知。族人從認知上把自己所活的族群與「鄒族」放在一起時，便可能強化「邵族」是「鄒族」一支的看法。這兩種情況，在在會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日治以來「族群」分類的典範，其在臺灣社會中的運作與演變，以及其在當代社會對於族群認知的影響。當然，要瞭解這些情況，所牽涉的問題已經不是本文可以處理的，並一定需要更多的田野與其他資料互相比對、驗證。

總而言之，若要對於日月潭地區原住民與其他原住民群體之間的社會、歷史及文化互動有更深入的瞭解，我們同時也必須更瞭解在每一個時代，原住民所接觸的知識對他們的影響。不然，只會像日治時代的觀光客一樣，沒有更多的瞭解，只有更多的附會。



圖 1 「(臺灣) 日月潭情調杵の音」

資料來源：《新故鄉》，2000 春季號（2000 年 3 月），頁 2。



圖 2 《東京大學総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撮影寫真力
タログ》第三部寫真，Plate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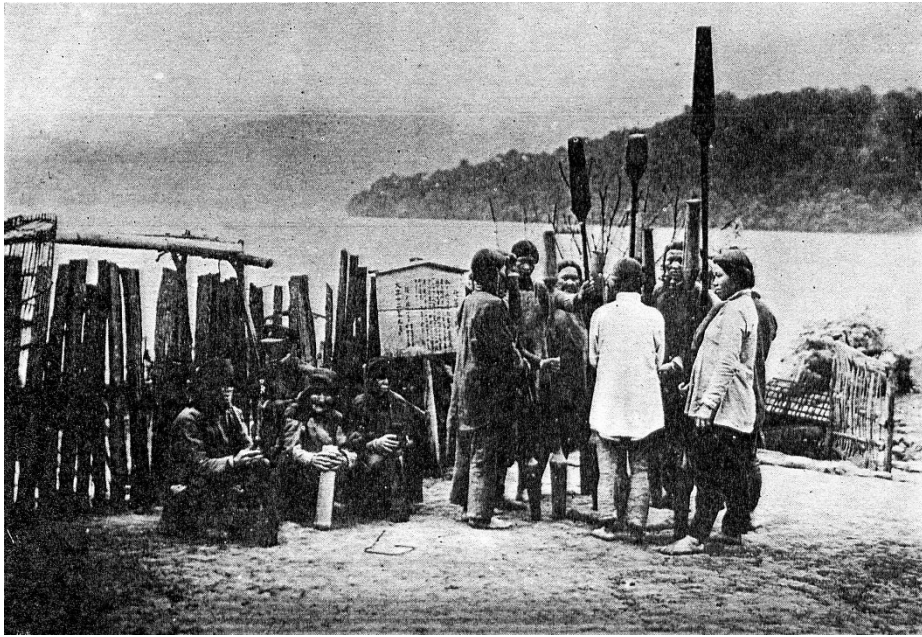


圖 3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

資料來源：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頁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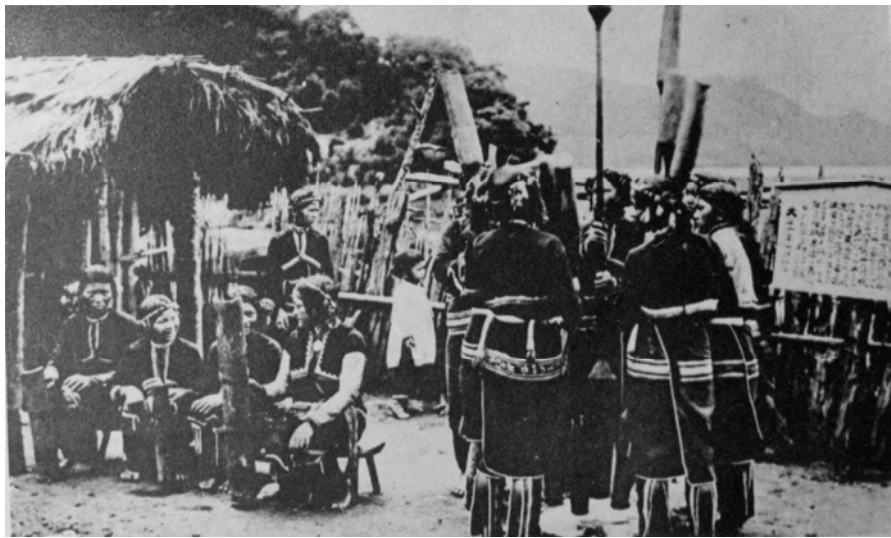


圖 4 《臺中州要覽（昭和八年事實）》

資料來源：臺中州編，《臺中州要覽（昭和八年事實）》，頁 191 前。



圖 5

資料來源：《新故鄉》，2000 春季號（2000 年 3 月），頁 19。



圖6 「日月潭的婦女」(明信片)

資料來源：不著撰者，《臺灣原住民群像(I)》(明信片)(臺北：立虹出版社，1998)。

引用書目

中華民國行政院

民國九十(2001)年8月8日發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函(台九十疆字第○四三九一四號)。

《臺灣原住民電子報》，2003年1月15日GAIS網站紀錄。

<http://www.kgu.com.tw/place/Idasau.htm>.

不著撰者

1998 「日月潭的婦女」(明信片)。《臺灣原住民群像(I)》(明信片)。臺北：立虹出版社。

丁曰健(編)

1959(1867)《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

2000 《新故鄉》春季號。

王慧芬

2000 〈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毛隆昌、簡史朗、白宏如

1999 《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種籽村建立計畫——日月村(卜吉社)期末報告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

成田武司(編)

1912 《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東京：成田寫真製版所。

伊能嘉矩

1973(1904)《臺灣蕃政志》。臺北：古亭書屋。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

1900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仲摩照久(編)

1931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東京：新光社。

杉山靖憲(編)

1916 《臺灣名勝舊跡誌》。臺北：臺灣總督府。

林文龍

1998 《臺灣中部的開發》。臺北：常民文化。

周鍾瑄(編纂)

1962(1717)《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 璽

1962(1835)《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

前島信次

1936 〈日月潭の珠仔嶼〉，《民族學研究》2(2): 191-213。

南投廳

《南投廳報》。南投：南投廳。

1913 《南投廳第三統計摘要》。南投：南投廳。

1920 《南投廳第一統計書（大正七年）》。南投：南投廳。

郝永河

1959 (1697)《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姚瑩

1957 (1829)《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莊士杰

1953 〈頭水六社化番風俗資料〉，收於《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頁 135-138。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莊永明（編）

1996 《臺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地誌繪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曹士桂（著）、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編）

1988 《宦海日記校注》（原名：《馥堂公宦海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陳計堯

2001 〈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1815-1934）〉，《臺灣史研究》7(1): 81-134。

陳偉智

1998 〈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

1996 《探險台灣》。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鳥居龍藏寫真資料研究會（編）

1990 《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力タログ》第三部寫真。東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

2000 《生蕃行腳》。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黃玉振

1896(1953)〈化番六社志〉，收於《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頁 131-134。
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黃智偉

- 1999 〈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叔璥

- 1957(1735)《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鈴木作太郎

- 1932《臺灣の蕃族研究》。臺北：臺灣史籍刊行會。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 1994《跨世紀的影像：烏居龍藏眼中的臺灣原住民》。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臺中州(編)

- 1935《臺中州要覽(昭和八年事實)》。臺中：臺中州。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

- 1934《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臺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3《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1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1963《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18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總督府(編)

- 1916-1931《臺灣事情》(大正五年至昭和六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 1939《臺灣觀光の栞》。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 1924《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記述報文附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 1916《蕃社戶口(大正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 1994(1936)《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編：戶口、內臺人との接觸、衛生》。臺北：南天書局。

劉枝萬

- 1951《臺灣日月潭史話——附霧社事件》。埔里。油印本。

- 1958《南投縣沿革開發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 1960《南投縣教育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 1962《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鄧相揚

- 1999〈水沙連地區的拓墾與邵族的處境〉(未刊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臺灣與華南社會（1600-1900）研討會」，1999年3月19至20日。

鄧傳安

1958(1830)《蠡測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謝世忠

1999 〈身份與認同：日月潭邵族的族群構成〉，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年5月1日至3日。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1904 《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中卷）。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1907 《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東京：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1908 《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東京：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94(1918)《臺灣蕃族圖譜》全二卷。臺北：南天書局。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藍鼎元

1958(1732)《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藤崎濟之助

1931 《臺灣の蕃族》（增訂版）。東京：國史刊行會。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1911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Taihoku, Formosa,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Torii, R.

1910 “Etudes Anthropologiques Les Aborigènes de Formose.” 收於《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部紀要》，第二十八冊第八編。

‘Thao’ and ‘Tsou’: Establish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Sun-Moon Lake aborigine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Kai-yiu Chan

Abstract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so-called Thao Tribe (of Sun-Moon Lake) belonged to one of the branches of the Tsou Tribe (of Ali Shan). This perception had once spread not even among the aborigines in both the Sun-Moon Lake and Ali Shan areas but also Taiwan’s general public. To clarify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hao’, this paper sets aside the academic contents of the ‘Thao’ in anthropological classifications, focuses on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view that ‘Thao as a branch of Tsou’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is article has demonstrated that during the Qing period when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s’ had not yet emerged, it is clear that records on the Sun-Moon Lake area distinguished the socio-ethnic impression of that region from the Ali Shan area. In the Japanese period which began to formulate classifications of ethnic groups, the aborigines of the Sun-Moon Lake area also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of being classifie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various social member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o the ‘Thao’ remained unclear, and different viewpoints prevailed. In other words, the view that ‘Thao as a branch of Tsou’ was not yet firmly established among both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s. The sources that viewed the Sun-Moon Lake indigenous people as a branch of the ‘Tsou’ actually came from the tourist industry which prospered during that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 legend of ‘tracing a white deer’ first appeared in 1916, which was soon adapted into a wooden inscript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Cultivated Savages’ about 1921. This process concretely stated the ‘origin’ of the aborigines in written form and introduced to tourists. Therefore, when anthropologists still disputing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s of these Sun-Moon Lake aborigine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ourists had already contacted an explanation which had undergone several reinterpretations and could lead them believe that ‘Thao as a branch of Tsou’.

Keywords: the Sun-Moon Lake Aborigines, Thao, ethnic group (*tzu-ch’un*), ‘cultivated savages’